



坚守本体： 语文教育的生命之根

Jianshou Benti

Yuwen Jiaoyu de Shengmingzhigen

主 编◎王慧琴

《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以语文学科来说，其课程本体就是“学语习文”，
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并
从中建设好人的精神家园。

坚守本体： 语文教育的生命之根

Jianshou Benti

Yuwen Jiaoyu de Shengmingzhigen

主 编◎王慧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守本体：语文教育的生命之根 / 王慧琴主编.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526-1453-4

I . ①坚… II . ①王… III . ①小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109 号

坚守本体：语文教育的生命之根

主 编：王慧琴

责任编辑：陆红亚 张雅光

装帧设计：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http://www.nbcbs.com>

联系电话：0574-87242865(发行部) 0574-87287821(编辑部)

印 刷：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370 千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526-1453-4

定 价：32.00 元

编委会成员

主编 王慧琴

副主编 杨三琳

编 委 陈 波 丁帅英 金美英

梁春萍 裴 丽 王 颖

吴芸香 邢 颖 俞月庆

序

2010年10月,越城区启动第二轮特级教师(名师)工作室,旨在进一步发挥名优教师的示范、指导、引领作用,搭建教师快速成长的平台,打造一批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先进的教育理念、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教科研能力的骨干教师队伍。三年来,第二轮名师工作室的102位学员在9位导师的悉心指导下,通过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校际交流和区域合作等途径,以课堂展示与研讨、论文指导与评比、读书交流与征文、外出学习与考察等方式且行且思、且研且践,留下了一串串守望教育的坚实足迹。

回眸处,清风明月见证了睿智、无私的导师们,带领工作室的各位同仁探索研讨于课堂,反思交流在课余……磨课、听课、评课,说课、研课、上课,乃至谈心得、说人生、抒大志……动人的场景,灵动的身影,定格着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画面;精美的文章,鲜活的实例,记录着大伙儿心灵的对话、思想的碰撞。第二轮名师工作室实施三年来,不仅结出了累累的教育科研硕果,而且带出了又一批敬业乐教、德艺双馨的教改、科研带头人。他们的一言一行、一课一文,带动了浓厚的校园氛围,构筑了教师的精神家园,促进了学子的茁壮成长,也精彩了教师的职业生涯。

今天,九个名师工作室分别将三年来的一些前行履印编辑成册,这既是盘点总结,更是梳理奉献。这些册子汇集了工作室的三年历程,收录了老师们近三年来的公开课教案,公开发表或者获奖的论文,教育教学的心得案例等等,彰显了各工作室从教改到课改的历程中前行的方向定位、理念策略。这些文集,选编的虽然只是各工作室三年成果的一叶一目,不足以以蠡测海,但缕缕



清香、累累硕果、份份感动仍扑面而来。鲜活的素材、生动的描述、鲜明的见解、真挚的情感，抒写着老师们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认真和执着，也折射出老师们对事业和孩子们的无私大爱。

读着这些篇章，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名师工作室已经真正成为了教师实现专业成长的理想舞台，成为了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这些集子，也启发我们，教育的规律源于实践，并且是有生命的，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借鉴、思考，只要我们敢于实践、质疑、创新。

教育需要深情地守望，守望那一片神圣的精神家园。守望需要不断远眺，仰望天空，坚守心中的梦想，把梦想变成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守望更需要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理想变成现实，变成奇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些集子，只是为越城教育名师工作室工作划上了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相信名师工作室对教育的深情守望，将引领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执着而无私地奉献于正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越城教育这片沃土！

寿建明(绍兴市越城区教育局副局长)

于2014年1月6日

目 录

contents

- 序 寿建明

第一章 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徜徉在语文本体教学的青山秀水间

- 语文本体教学的学理观 (王慧琴)002
历史回望:语文本体何以多次失落 (王慧琴)006
语文本体教学与母语文化 (王慧琴)011
语文本体教学与有效教学的相关性审视 (王慧琴)017
从语文本体教学看“小学语文”应是“儿童语文” (王慧琴)022

第二章 教学设计:语文本体教学的美丽蓝图

- 《画家和牧童》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陈 波)030
《五花山》教学设计 (陈 波)034
《爱迪生救妈妈》(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丁帅英)038
《小小的船》(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丁帅英)043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金美英)048
《刷子李》教学设计 (金美英)052
《怀念母亲》(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梁春萍)057
《金钱的魔力》(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梁春萍)060
《我的开学第一课》 (裘 丽)064
《太阳是大家的》(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王 颖)068
《最大的“书”》(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王 颖)072
《长城》(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吴芸香)076
《猫》(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吴芸香)079



《棉花姑娘》(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邢 颖)082
《陶罐和铁罐》(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邢 颖)086
《和时间赛跑》(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杨三琳)089
《我是什么》(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杨三琳)095
《回声》(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俞月庆)100
《最大的书》(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俞月庆)103

第三章 教学实录：语文本体教学的清晰履印

精略相辅重自悟 习得方法重拓展	(陈 波)108
咬定语言不放松 觅得智慧表达点	(陈 波)117
书山有路“趣”为径	(丁帅英)125
让童话教学充满童话	(裘 丽)132
无痕比读 兴趣扩读	(俞月庆)137

第四章 教学论文：语文本体教学的理性思考

比读，打开名家名篇教学的另一扇窗	(陈 波)146
有效性阅读教学探究	(陈 波)150
让学生爱上作文	(金美英)154
优化教学设计，让中高段阅读教学更有效	(金美英)157
语文课堂多元解读教师该做什么	(金美英)161
借主问题，让“微阅读”成为课堂教学的常态	(梁春萍)164
顺应童心 水到渠成	(裘 丽)167
异中有同 同中求异	(裘 丽)171
从追随、迷失到突破	(王 颖)175
浅谈绍兴童谣在小学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现实意义及开发设想	(王 颖)178
无痕训练：让语文课堂更有效	(吴芸香)182
小学作文“取材有道”	(吴芸香)186
寻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春天	(邢 颖)189

以画引话,以话导写	(邢 颖)194
高考作文“每错一字扣一分”	(杨三琳)196
说明性文章有效教学策略探微	(杨三琳)200
出色源自本色,请还低段写话的本真	(俞月庆)204

第五章 学术报告:语文本体教学的亮丽风景

与名家名篇同行,点亮低年级孩子微作文启蒙之路	(陈 波)210
提高城郊结合部学生识字效益的研究	(丁帅英)220
借助预习问题,实现课堂教学变革	(梁春萍)228
提升教学反思有效性的策略研究	(吴芸香)238

第六章 教学故事:语文本体教学的炫目亮色

支教送给我的礼物	(陈 波)246
怎么告诉他就是你要思考的细节	(丁帅英)249
拉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	(金美英)252
读书毯上的小脚丫	(梁春萍)254
较真? 叫阵!	(裘 丽)256
野百合也有春天	(王 颖)258
我们幸福地追随着.....	(吴芸香)260
会打架的拖把	(邢 颖)262
那天,窗外飞来一只小鸟.....	(杨三琳)263
想说爱你不容易	(俞月庆)268

第七章 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行走在语文本体教学的幸福之路上

“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三年行旅路线图	(吴芸香)272
“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三年经营总盘点	(陈 波)288

第一章



DIYIZHANG

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 徜徉在语文本体教学的青山秀水间

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是大自然的造化。看不到这种系统的联系性,就会使思维陷入孤立和僵化。但是,万事万物之间毕竟是互相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本体是各不相同的。本体的相异,才确定了它们本质的不同,也才有了各自独特的个性而得以独立存在于世,成为不可缺少也无法替代的重要一部分。以语文学科来说,其课程本体就是“学语习文”,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并从中建设好人的精神家园。说白了,“语文”的课程名称,就最本质地点明了它的本体: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学语文,就是要学好作为母语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特级教师郑晓龙(北京)说得好:“语言文字是个篮子,里面装了思想情感、观点主张、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提起篮子,什么都有了;丢掉篮子,两手空空。”然而,也正因为语文作为人类思想交际的工具,具有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特点,也就容易误入“什么都是语文”的“泛语文”、“非语文”之窘境,而遮蔽了语文的本体。正如有人幽默地表示:我们的语文是“大众情人”,天生的一段风骚,它与精神攀亲,同思想结缘,距革命最近,与生活一体,跟政治最紧。人见人爱的结果,自然是它——“公众”,就没有坚守本体、依性生存的可能了。这不能不说这是语文教学“高耗低效”老大难终成痼疾的根本原因所在。

近期,由中央教科所、《中国教育报》联合推出的《中国教育发展系列报告》中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指出:在小学的语文、数学、科学、品德与社会四门学科中,数学的合格率最高,科学、品德与社会居中,语文最低。数学达到合格及以上水平的学生最多,占78.3%,科学为71%,品德与社会为63%,语文最少,仅为62.8%,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是处于基本合格水平,即对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足……由此看来,关注学生的母语学习,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作为语文教学工作者,自然责无旁贷。而提升语文课程的本体意识,尤其在小学阶段更要扎实打好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的基础,已是迫在眉睫。这也正是“王慧琴特级教师工作室”进行“语文本体教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语文学本体教学的学理观

在生活中“本体”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通俗地讲，就是事物本身。但在哲学范畴里，“本体”是同“现象”相对应的一个词语，一般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的直观对象。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本体”就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常用术语。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本体与现象就构成一对范畴，本体指的是物的自体，或自在之物，是不能为知识所达到，但能为信仰所揭示的东西。我在这里绝非赘述，只是希望说明对“本体”的认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本体”的解读还是应当花一点心思的。

首先，“本体”的“本”是什么？“本”的原意是指草木的茎干或根。所以，在字形上从“木”。《国语·晋语一》有云：“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引申为事物的根源或根基。如“溯本穷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也是这个意思。明确了“本”的含义，“体”也就不难理解是指物的自身存在。

与“本体”近似的有两个词：“本原”与“本质”。

“本原”，在词典中的释义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根源和元素，反映了世界具有的统一性。

“本质”是指本来的品质或质地。它与“现象”相对。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也就是事物本体的性质。“现象”则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当然会比现象更深刻、更稳定；而现象总是比本质丰富而易变。所以，本质可以决定现象，但所有的现象不一定代表本质。因为在现象的丰富性中有真象和假象。假象是本质的一种歪曲的表现。

探究语文的“本体教学”，我们还不能不关注哲学中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质或本性问题的理论。在西方哲学理论中，从古希腊起，就已对“本体论”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到18世纪，德国的沃尔弗才将其概括为“本体论”，并作了比较深入的阐发。他认为“本体论”是“哲学的理论科学”，在哲学的知识体系中居于最高级的地位。他的这一主张在西方哲学界一直都比较流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不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但有时也把它当作关于存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的同义词来加以使用。

在对“本体”一词的相关概念作了一些宽泛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语文学本体教学，就是指基于语文课程本质本性和本色的教学。著名语文教育家李

杏保、陈钟梁在其所著的《纵论语文教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便把“本体观”列为语文教育观的首位(本体观、整体观、辩证观、发展观……),他们所认为的“本体观”,也就是对“语文学科独具的特性及其使命的本质的研究”。

我们要重视对语文本体教学的研究,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魏国良在其所著的《现代汉语教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感慨:语文本身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又太让人想说个清、道个明,以至于生出了“欲说还休”的尴尬。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语文所承载的功能实在太多,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出其右;语文所受到的评判实在太多,只要识字的都可以有一番品头评足的见解;语文的“改革”也实在太频繁,以至于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当语文教师天天穷于“适应”而惶惶然身心交瘁,往往会连一些最为基本的概念都模糊起来,如什么是语文学科,它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究竟应是何种地位,起什么作用;什么是语文教学,它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教学方式,又如何看待曾经和现今的语文教学方式……显然,所有这些尴尬,都与对语文学科、语文教学的本体认识模糊有关。

确实,“语文是什么”之所以模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语文都不是单独设科的,而是和经学、史学、哲学混杂在一起。清末以前,我国只有传统的封建教育,以后,由于八股取士和科举制度的日渐衰落和帝国主义入侵,封建教育制度存在的大量问题暴露出来,才出现了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先后提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革新主张,清政府才正式指令改书院,设学校。这样,在课程方面,也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开设了“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设12门课,其中包括“读经”和“词章”,前者读《书经》《周礼》《仪礼》《周易》,后者学记事、说理、章奏、传记诸体及诗词歌赋等,可见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的一套,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语文课程。直到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取消“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统一称为“国文”。并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舒祈城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初高级小学更明确要求“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练习语言”等。至此,语文才从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中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以后,语文学科在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统称“语文”。

那么,“语文”是什么呢?仍是众说纷纭。有人理解是“语言和文学”;有人则侧重于“语言和文章”;现在更有人强调是“语文和文化”……然而根据当时任教育部长并确定“语文”这一学科名称的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先生认为:“‘语



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由此可见，所谓“语文”，就应当指的是“语言文字”。“语言”就是口头语言，“文字”当然指的是书面语言。对此，张隆华等在其主编的《语文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中认为：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此，这应当是语文的基本属性。语言文字作为思想交际的工具，才有了它的全社会性、广实用性和超时空性。工具性才是语文学科最基本的性质，才是它的本质属性。否认了这一点，就抹杀了语文学科的本质特征。当然，语文学科还具有思想性，这是因为语文是思想交际的工具，是有强烈的思想情感的；语文学科还具有文学性，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用于语文学习的课文，都是文学作品。语文教学当然也就不可能不讲文学欣赏，不讲语言艺术。但是思想性和文学性都不可能离开语文的工具性而独立存在。如果我们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显然，语文教学不可能仅仅只是文学教学，它的教学使命应当远远大于文学；如果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章”也不妥，因为语文课程不仅仅只是读文章和写文章；如果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化”，则又会导致语文教学的泛化。文化的概念完全可以蕴涵语文。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全部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这显然不是评议语文学科可以承担得了的。足见对语文本体的正确认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真正实施好语文本体教学，才能确保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度。这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的重要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语文的本体教学，是因为语文作为思想交际的工具，必然会渗透到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也必然会体现在文化范畴的角角落落。但反过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绝不会全是语文课程的根本任务；文化的角角落落，也绝不会全成为语文教学的本体。作为语文现象可以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但它不一定是语文课程的本质。作为语文课程的教学必须紧紧把握其性质、任务和目标，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泛语文”的误区，加剧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的痼疾。

语文教学疏离了课程本体，而导致“泛语文”的倾向，确实比较严重地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实际之中。一位老师执教《西门豹》一课（人教版三年级下册），上课出示课题之后，老师就让同学说“西门豹姓什么、名什么”，一学生说“他姓西，名门豹”。不少同学就举手为之更正“他姓西门，名豹”。于是，老师扯出了《百家姓》，并且一口气背出了百家姓中的全部复姓。在读到“魏王派西门豹去管理漳河边上的邺”这一句话时，又说开了“魏”“漳河”“邺”等相关的春秋战国时代行政区划的沿革。在西门豹惩治巫婆、官绅头子时，老师又联系了“三十六计”，让大家猜三十六计有哪些计，西门豹用的又是哪一计。学生当然猜不出来，老师便

一一列举，并说，西门豹这一计叫“擒贼擒王”，有关“三十六计”的书中讲“擒贼擒王”这一计时，举的就是西门豹这个故事。接着，老师又放了“西门豹治邺”的电视剧片段，出示了“西门豹治邺”的连环画。这时，已经快下课了，老师还要学生以“铁齿铜牙纪晓岚”这样的句式为范，来把课文改编成《×××西门豹》电视剧本。这时，下课铃声响起，学生当然没时间写电视剧，他们也不会改编电视剧。好在这是借班上的公开课，上完课老师便一走了之，与学生各奔东西，自然也就完全可以一句“留到课外去做”打发了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课例，但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背离了课文本体教学的课堂之危害。我们当然不能说，“百家姓”、“古代行政区划沿革”、“三十六计”乃至“观赏电视剧片段”和“改写电视剧”等等与语文教学，甚至与课文内容没有一点联系。学生了解这些历史遗存和文化知识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问题在于，作为语文课程，它的根本任务是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通过这一篇课文让学生来学语习文，提高识字学词和读写能力，并从中获得情感的熏陶，才是这短短的四十分钟（一节课）时间里最应当做的。一篇《西门豹》才千把字，但它所牵连到的知识内涵和人文情怀却是千头万绪，如果要牵扯开去讲深讲透，即使讲上几天也讲不完。当然也没必要讲完，因为他可能在一辈子中都会有机会再学到。现在，对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在短短的一节课里，他最应当学到的是什么？根据语文课程的性质、任务，他必须基本掌握这篇课文中的生字新词，能够把课文读通顺，能理清课文的基本层次，略知大意。在这个基础上为故事所感动，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从而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整体能力。应当说，这才是关于课文本体的教学。

“什么是课文本体教学”，这对语文教学来说，似乎应当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正是许多的“常识”，却蕴含着朴素的真理。也因为可能是常识，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人类以无穷的智慧创造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但最不了解、最缺乏研究的正是人类对自身的研究。这也许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普遍定则。我们对什么是课文本体教学，是否也陷入这样的迷津之中。口口声声说“语文”，却没能充分地对“语”和“文”的特定地位和实施途径作确切的认识和认真的探索。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遗憾！

（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王慧琴）



历史回望：语文本体何以多次失落

从孔子兴学算起，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语文不是单独设科的。“语文”之科不立，当然也就谈不上语文课程“本体”的存在。从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看，小学教育的实施，大致是以清光绪四年（1878）张焕纶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为起点。初办时，学生四十余人，分大中小三个班级，课程中也开始设有“国文”（正蒙书院后改名为梅溪小学堂）。这应该是以后语文独立设科的先河。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也就叫“壬寅学制”，但由于学制本身的不完备等原因，这个学制没有实行。次年颁布的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了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尽管这个学制仍在强调儒家经典在语文教育乃至全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中国文学一科毕竟应运而生。因为在这个章程中规定的八门必修学科中有了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正规化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在教育界还占势长达十余年之久。

在此后的历史时期，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语文教学一直随着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断推进和发展。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才统一称为“语文”。最早的如1949年4月，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审订老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小学课本时，就决定废除“国文”的名称，统一称为语文。1957年由宋云彬等人编辑的初、高中语文课本，也称“语文”。在课本的《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这套课本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语文”课程从名称的确立到内涵的发展，有了天翻地覆的进步，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却是人们不断地在追寻的“怎样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这一根本性问题。其原因便是语文本体在语文教学中的多次失落。我在这里作一粗略的历史回望，也许会有助于坚定我们对语文本体教学的认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重道轻文”的文道之争，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背离了语文课程本体——

“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是语文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原本是就文章的写作评析与教学上来说的，意思是文章的形式与所表达的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道之争，却多是在于语文教学中语文知识教学与思想教育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正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语文教学比较重视“道”，更多地强调语文课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语文教学工作同样要“政治挂帅”。特别是1958年开展的“教育大革命”，更是把“突出政治”提高到空前的位置，严重地冲击了语文教学“文”的落实，语文课便与政治课没有多少区别。这无疑是对语文课程的严重背离。因为“文”、“道”统一，是我国语文教育传统的一个宝贵经验。唐朝的柳冕说得好，“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如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全唐文》卷五二七）。宋朝的朱熹更深刻地指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辑略》卷八）。他重视名物、训诂之类的所谓“文”，同时也注意“用力于世”的所谓“道”。文以载道，道以文显。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总是这样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文章创作上的文道统一观，当然也完全适用于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与思想教育之间的关系。如若重道轻文，则不但提高不了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也不可能真正使学生在思想教育上受到熏陶感染，离开了语言文字的形象感化力，思想教育只能是僵化、干瘪的说教，失去了感人的力量。为此，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长篇社论，郑重地提出了语言教育的任务。1959年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提出了语文教学的文道统一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是比较明确的：“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培养和提高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并通过教材内容的教育和感染，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语言文字之“文”是“体”，“正确的观点、健康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之“道”是“魂”。躯体和灵魂的关系是统一的，魂要附体，体要显魂。显然，当时讨论的这些基本观点，是对语文本体教学的呼唤和坚守，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

二、“大跃进”极“左”思潮，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政治服务，歪曲了语文本体的存在——

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之后，1958年全国就掀起了所谓的“大跃进”运动。这时，语文教学界也有人提出要搞语文教学的“大跃进”，主张上“双高课”。所谓“双高”，就是“高速度、高质量”，一堂课要由一个思想政治内容来统率，以一篇课文带动二、三、四、五篇课文。这种所谓的“大跃进”，完全把语文教学作为政治



思想教育来进行，语文课程的“本体”遭遇异化、歪曲和取消。这是语文教学本体失落的又一次劫难。这场劫难解除不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冲击下，语文课程的本体教学，不可避免地在劫难逃。当时，有人主张把政治、语文、历史统在一起，改名为“政文课”；也有人主张把政治、语文、音乐、美术统在一起，改名为“革命文艺课”。批判原有的语文教材是“封资修”的“黑货”、“大杂烩”，而改用“语录”、“社论”、“最高指示”为教材……学校停课闹革命，语文学科当然也不复存在，语文本体教学更是无从谈起了。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本于极“左”思潮的政治运动，都强调语文教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都对语文课程本体全盘否定。虽然在“大跃进”之后于196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是对这次曲折的否定；“文革”之后于1978年制订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又是对“文革”带来的曲折的否定，重新希图澄清语文课程的本体教学，但这两次反复对语文教学的破坏是极为严重的，其“宁左忽右”的思潮影响更加深远。

三、“红领巾”教学法的负面影响，又把语文课上成了重情节分析的故事课，淡出了语文本体的教学——

首先应当指出“红领巾”教学法在中国语文教学的改革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1953年5月，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在北京市女六中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评议会上，批评了当时一般流行的语文教学方法，主要有“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一篇课文的教学时间太长”，“把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妨碍了语文的发展”和“教师很积极，但学生并没有积极的形式”等。第二天(5月27日)，由师大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按普希金教授的指导意见，再次试教《红领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年七月，《人民教育》发表了《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和短评《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由此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注意，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学习讨论和观摩教学，进行教改试验。于是，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之为“‘红领巾’教学法”。显然，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中，“红领巾”教学法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也是巨大的。

但是，普希金教授的意见，毕竟是根据苏联语文教学经验，针对《红领巾》这样一篇小说的教学而提出的，更多地体现了苏联语文课“文学”和“语言”分科的特点，是针对文学教学提出的。这与中国语文教学的情况不一样。由于普希金把“文学分析”当成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提问”“谈话法”当成唯一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加上我们在学习普希金教授意见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就难免会出现一些形式主义的倾向。而且，这种影响是颇为深远的。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提问教学法的大行其道，在语文教学中烦琐地进行课文的情节分析，只满足于让学生了解课文“说什么”，而淡化了对语言文字的品